

哲 学

中国古代认识论之发轫

夏乃儒

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没有认识论，这种见解在现今的学术界是很少见闻了。然而在作中西哲学比较和探讨中国哲学史特点时，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只是一种伦理化的哲学，认识论很不发达，不占重要位置，此类观点却时有所闻。当然，这个问题只有在哲学界对中国认识论史作充分的研究、讨论之后，才会有比较一致的看法。近读冯契同志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书中提出：“如果说中国传统哲学中认识论不占重要地位，那么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中自然不会占重要地位了。”我十分赞同。我们的祖先在一定的认识理论指导下追求真理，认识真理，并取得了举世赞叹的成就。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理应在世界哲学史上占有它应有的位置。本文概述中国古代认识论发轫时期，先秦诸子在认识理论方面，达到何种高度，对人类认识史作出了哪些贡献。

古代认识论的孕育与诞生

中国古代没有用“认识论”这个词，而是采用“求知”论，或“致知”论^①。这种“求知”论、“致知”论，并非随古代文明创立而创立。当宗教天命观还牢牢地紧箍着人们的头脑时，当人世间的一切都用“受天命”来解释时，是没有什么认识论可言的。

从《尚书》这部我国最古的历史文献来看，在夏、商、西周三代尚无认识理论出现。尽管“知”的概念在《尚书》中已经出现。《虞书》里记载皋陶曾说过“知人则哲”（《尚书·皋陶谟》），这是不是一个认识论命题呢？还不是。下文说：“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②认为人谈不上有知思，只有天才有“天聪明”、“天明畏”，人只是根据天命用人行事，就算是智慧的了。《商书》中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说命中》）倒确是一个认识论命题，且对后世很有影响。可是《说命中》是伪《古文尚书》中的一篇，其作伪时代当为东晋。当然不能引为商殷已出现认识论的依据。《周书》记载周公的一段话：“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穡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尚书·无逸》）意为懂得稼穡之艰难，才能懂得百姓之疾苦。离开“受天命”来讲君子之“知”，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据今人考证《无逸》篇成文于春秋末

① “求知”见《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致知”见《大学》：“致知在格物”。

② “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句，一说应断句为“予未有知”，又“曰”字应为“日”。但在释皋陶言已未有所知方面，两者并无异义。

年，其思想内容与周初已不甚吻合。^①

另一部古书《周易》古经，成书于周文王之后。虽为占筮用书，但从中已可窥见一些哲学思想逐渐萌芽的消息。透过占筮以测问天意的迷信形式，我们可以看到周人对人事作为的强调。人们对已卜的吉凶祸福的可能性，作出某些选择，并用行为来取得较好的结局。透过感性直观的取象之辞，我们还可以看到周人的抽象概括能力有了提高。人们对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进行概括，得出诸如“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九二》）这样富有哲学意义的结论来。即使如此，在《易经》中，认识理论是没有的。在全部六十四卦的卦辞、爻辞中，只有一处出现“知”字。《临·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李镜池认为临卦“前半说德治，后半说人治。在周公提出的德治的基础上加上‘知’，这是作者的新见解，对后代影响很大”。^②这个估价是相当高的。但也仅此而已。究竟“知”的内容是什么，怎样达到“知”，《易经》语焉未详。具体加以展开的，那是在战国中后期出现的《易传》中。

中国古代认识论在西周时期尚无产生的条件，到了春秋末期这个条件成熟了。这首先是由于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科学战胜迷信，哲学挣脱宗教天命观的束缚，有了可能。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出现，标志着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联的一些科学技术有了较快的发展。如《春秋·文公十四年》记载了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为世界上哈雷彗星的最早记载。前六世纪已发明以十九年七闰月的置闰方法制定历法，比希腊人又早了一个多世纪。再如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医学文献《五十二病方》，据考证成书不晚于春秋战国之际，其中记载了病名有一百零三个，药方达二百八十则。随着人们关于天文、地理、人体等方面知识的积累，进而探求这些知识的来源和可靠程度的日子就不远了。其次，由于新的封建生产方式需要为自己迅速发展开辟道路，而一些陈旧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又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整个社会处在激烈动荡的状态。“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③，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用天命论来解释社会现象，过去是认为天经地义的，而这时却不灵了。一些先驱者纷纷提出新的见解。如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④还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⑤。已经触及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关系、社会知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作用之类问题。

孔子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创建者。虽然他没有写下系统化的理论著作，但是从他一系列的学术主张中，还是可以看出孔子确是建立了包括认识论在内的学说体系。孔子学说体系，大致可概括为：“礼——仁——知”。把“复礼”作为奋斗的政治目标和神圣使命，这在当时并非是合乎潮流的新思想。孔子独创性的贡献在于两点：一是纳仁入礼，仁礼结合；一是以知求仁，仁知统一。第一点，纳仁入礼，对濒将衰竭的“礼”的躯体，注入了“仁”的新鲜血液。从此，在“善”的领域内，人们遵循行为规范的准则，不仅仅是外在的强制，而是更重视内在的理性自觉。所谓“为仁由己”^⑥，“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⑦，即是如此。单是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而不把为“仁之方”具体化，不免使人有神秘的感觉。可是

① 张西堂：《尚书引论》，第194页。

② 李镜池：《周易通义》，第41页。

③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④ 《左传·昭公十八年》。

⑤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⑥ 《论语·颜渊》。

⑦ 《论语·述而》。

孔子并不停留于此。第二点，以知求仁，孔子把“知”视为求“仁”的必要条件。他说：“未知，焉得仁？”^①这样，孔子的思想，又从“善”进入了“真”的领域，创立了中国古代最初的认识理论。

孔子的认识理论，涉及到认识来源、认识方法、途径，以及认识是非的标准等广泛的问题。关于认识来源，固然，孔子并未摒弃“生而知之”的先验论观点，还把“生知”列为认识能力的“上”等。可是，在孔子认识论中占重要位置的，倒是“学而知之”。他强调“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②，认为高尚的道德和充实的知识都得靠学习来达到。他还把“学知”具体展开，提出了学、习、闻、见、察、思等一系列范畴。为清晰起见，列表如下：



关于认识方法和过程，孔子认为知识靠“多闻”、“多见”来获得。对闻见得来的知识，不可都信以为真，必须亲“察”，“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③，然后“择善而从之”。孔子还进一步提出相当于理性认识阶段的“思”。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④，学与思两者不可偏废。他强调在闻、见的基础上，进行“九思”^⑤，并在“思”的过程中进行举一“反”三的推理。关于认识是非的标准，孔子虽然没有用明确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从他论述为“仁之方”中可以看出：孔子认为每个君子都存在理性，理性即能判断是非。“推己及人”的过程就是理性作出判断、抉择的过程。有时，孔子还把言与行两者的统一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说：“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⑥这种不确定性，是孔子所处时代争鸣尚未全面展开的反映。

作为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开创者，孔子的贡献是很大的。他几乎触及了认识论所研究的最基本方面的问题。黑格尔对孔子有些偏见，认为“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⑦。实际上，初创的认识论，有如此的广度和深度，是相当出色的。如果没有孔子的认识论，就不会有整个先秦时期认识理论大发展所达到的新高度。

古代认识论初创后的大争辩、大繁荣

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初创，正值社会正处在剧烈变动的时期。一批文人学士纷纷用孔子所提供的认识理论和范畴，来观察和解释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双方都在迅速发展着的关系，并企图克服孔子认识论所存在的内在矛盾。于是，出现各派认识理论的大争辩，带来了学术文化的大繁荣。在战国初、中期，经验论、先验论、静观论、怀疑论、诡辩论、摹略论相继出现。各派围绕着“名实”之辨，探讨了认识论的主要问题。其参与争辩学派之众多，探讨问题之广泛，研究之逐渐深入，在世界上只有古希腊哲学才可相与媲美。

① 《论语·公冶长》。

② 《论语·阳货》。

③ 《论语·上灵公》。

④ 《论语·为政》。

⑤ 《论语·季氏》：“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⑥ 《论语·公冶长》。

⑦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19页。

经验论的代表是墨子。与儒家注重先验的道德体验相迥异，墨子注重众人的感觉经验。他认为“众之耳目之实”是认识的根源，“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见莫闻，则必以为无”^①。他提出的检验认识是非的“三表”中，“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指的是间接经验，“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②，指的是直接经验。把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作为真理的标准，显然具有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倾向。可是，墨子的经验论并没有否定理论思维的作用。他倒是十分重视逻辑推理，主张通过“谋”（思虑）达到“以往知来，以见知隐”^③，并且在中国认识史上首先提出“类”、“故”、“理”的逻辑范畴。

先验论的倾向，在孔子“生而知之”观点中已经具有了。可是先秦时期“先验论”的代表当推孟子。孟子提出系统的先验论观点。他认为人的认识能力（良知、“良能”）、认识的内容（仁、义、礼、智）、认识是非的标准（理义）都是天所赋予的。认识的途径与目标，就是“尽心”——“知性”——“知天”。求学问的实质，只是找回散失了的天赋理性，“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④。孟子把“心之官”称为“大体”，“耳目之官”称为“小体”，提出“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⑤，这种推崇理性而轻视感性是不可取的。但是，他所说的“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⑥等，接触到理性思维的一些特点，有其合理因素。

“静观”论，由老子首创，经稷下黄老学派改造得以发展。老子的静观论，有两重性。一方面，老子认为作为天地万物之根源、宇宙发展的根本法则的“道”，靠感觉经验是把握不到的。只有使认识主体保持“致虚极，守静笃”^⑦的状态，也即是通过“涤除玄览”，才能把握“道”。强调认识主体要虚心，力戒浮躁和主观主义，通过理性思维来掌握规律，这是可贵的见解。另一方面，老子却认为感觉经验不仅不可靠，而且很有害。“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⑧。因此要“塞其兑，闭其门”^⑨，堵塞一切感觉通道。这样，老子所说的“知”，只能是一种“微妙玄通，深不可识”^⑩的神秘主义的直觉。稷下黄老学派的静观论，反映在《管子》一书中的《心术》、《内业》等篇文里。他们改造了老子的静观论，提出“洁其官，开其门”^⑪，既打开感觉的通道，又保持思维时的虚静，不受主观成见的干扰。“静观”论被树立在唯物主义的基地上了。不过，这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反映论。

怀疑论登上哲学舞台，是与“其学无所不窥”的庄子分不开的。庄子对当时已出现的种种认识理论，提出一系列的责难。他从相对主义观点出发，对客体的可认识性，主体的认识能力和真理的标准，都表示怀疑。他认为认识客体的千差万别都是相对的，从“道”的角度来看，都“复通为一”。差异往往是由观察者的观察角度不同造成的，“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⑫。他认为言、意根本无法把握“道”。“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

① 《墨子·明鬼下》。
② 《墨子·非命上》。
③ 《墨子·非攻中》。
④⑤⑥ 《孟子·告子上》。
⑦ 《老子·十六章》。
⑧ 《老子·十二章》。
⑨ 《老子·五十六章》。
⑩ 《老子·十五章》。
⑪ 《管子·心术上》。
⑫ 《庄子·德充符》。

焉”^①。对于无形无象无精粗可言的“道”，是不能靠语言、逻辑思维来把握的。他又以生命之“有涯”，知识之“无涯”，得出“以有涯随无涯，殆已”^②。他还认为判断是非的客观标准是找不到的，“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③，“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④是非之界限根本无法辩明。庄子的怀疑论在促使古代认识论趋向于深化方面的贡献，是不能抹煞的，尽管他的许多结论是错误的。

诡辩论，指的是以惠施和公孙龙为代表，所展开的“坚白同异”之辩。他们分别从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角度考察了对客观事物同异关系的认识。惠施强调世界的同一性，提出“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万物毕同毕异”^⑤，抹煞了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公孙龙则强调事物之间、事物各属性之间、感官的职能之间的差异性，提出“坚”与“白”可与“石”相分离而独立存在，抹煞了事物之间的同一性。作为认识发展史上的诡辩论，黑格尔称之为是一种“合理化论辩”的观点^⑥，是认识发展的必要环节，是不可任意否定的。

“摹略”论，用来概括战国中后期发展起来的后期墨家的认识论，是由于他们在论述“辩”的任务和原则时提出：“摹略万物之然，论术群言之比”^⑦。这实际上是反映论的别名。后期墨家汲取了战国时期天文学、光学、力学等自然科学成就，汲取了其他各派认识论的经验教训，克服了墨家创始人墨子的经验主义。从他们对“知材”、“知接”、“知虑”、“知明”等认识论范畴的区分与阐明，可以看出后期墨家已经接触到认识的受动性与能动性之间的关系。“摹略”论已不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反映论了。《墨经》把认识领域划分三大类：“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⑧“物之所以然”，指认识客体及其发展规律；“所以知之”，指主体的认识能力；“所以使人知之”，指使他人也认识的语言、文字、概念。当然，我们不必把它与波普的“世界1·2·3”理论相比拟。在二千多年前就对认识领域里种种现象作如此精辟的归类，我们不能不叹服《墨经》作者思想之深邃！不仅如此，后期墨家还建立了包括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三大部分完整的中国古典形式逻辑的科学体系。

从以上的概述中，我们约略可见：战国时期有如此众多的认识理论竞相争鸣，这在世界认识史上是大放异彩的。在争鸣中差不多涉及到认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认识的来源是经验还是理性，或是两者都是？经验知识和理性知识何者可靠？人之所以可能把握“道”的条件是什么？什么是检验认识是非的标准？在认识过程中如何处理相对与绝对的关系？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关系如何？儒、墨、道、名各家分别考察了人类认识过程的一些环节，在上述某些问题上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为人类认识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互相诘难，反复辩驳，也为后来的荀子进行比较全面的总结创立了条件。

发轫时期认识理论的峰巅

战国末期，对发轫时期的认识理论大争辩作出全面总结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荀子·正名》有段话：“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反映了融

① 《庄子·秋水》。

② 《庄子·养生主》。

③④ 《庄子·齐物论》。

⑤ 《庄子·天下》。

⑥ 黑格尔：《小逻辑》，第263页。

⑦ 《墨子·小取》。

⑧ 《墨子·经下》。

合百家认识理论之长,总结先秦名实之辨,是当时社会正欲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的要求。而少年时即“有秀才”的荀子,具备了全面地总结先秦名实之辨的主观条件。齐威王、宣王时,曾“聚天下贤士于稷下”。稷下学宫汇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轻重等百家之学,是当时各学派荟萃中心。荀子曾在稷下“三为祭酒”。这使他有可能精心研究百家之学,然后博采诸子之长。这在他反对“蔽于一曲”的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荀子的认识论,既是朴素唯物主义的,又是朴素辩证法的。在一个学说体系中,两者兼而有之,这在古代认识论的发轫时期,是难能可贵的。即使是象亚里士多德那样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①,也难以做到这一点。荀子对发展古代认识论的贡献是巨大的。

首先,荀子的认识论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可知论。他不赞同庄子的不可知论。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②,认为人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而客观事物的规律可认识的。不仅是有形有象的事物可以认识,“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③就是整个宇宙的普遍规律也是可以掌握的,“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④。对于孟子的先验主义的可知论,荀子更不赞同。他强调主体认识必须符合于认识客体,“知有所合谓之智”^⑤,必须通过“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⑥。与墨子的经验主义的可知论也不相同,荀子的可知论超出经验的范围,因而可以收到“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⑦之效。

其次,荀子的认识论是辩证地处理感性与理性关系的认识过程论。他认为认识始于人的感官对外界事物的接触。“缘天官”,“待天官之当薄其类”^⑧,然后才有思维可言。这与老子、孟子鄙薄感觉经验相迥异。可是,荀子并不停留于此。他认为单凭感觉经验,会产生错觉。“冥冥而行者,见寝石以为伏虎”,由于“冥冥蔽其明”;“从山上望牛者若羊”,由于“远蔽其大”,“以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著”由见“高蔽其长”^⑨。他强调心(天君)在认识过程中能起主导作用,“心有征知”,征知即对感觉材料进行分类,加工,综合、检验。没有这种“征知”作用,“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⑩。荀子认为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根本方法和途径是“虚壹而静”。经过“虚壹而静”,即冷静思索,排除成见,取舍综合,去伪存真,就可以“定是非,决嫌疑”了。这是对稷下黄老学派的“静观论”中辩证法因素的进一步发挥。

再次,荀子的认识论也是一种全面地客观地认识事物的方法论。荀子回顾百家在争鸣过程中,往往“蔽于一曲”而陷入片面性,他深感“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⑪。如何“解蔽”,克服片面性的弊病呢?荀子提出一系列的原则和方法。他提出了“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包括分析和综合的统一,理论和事实的统一两条原则^⑫。荀子还强调“兼陈万物”,把各种主张都充分地摆出来,然后反复地进行比较。他说:“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⑬用全面衡量、反复比较的方法,来克服认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22页。

②③④⑥⑦⑧⑩⑪ 《荀子·解蔽》

⑨⑫ 《荀子·正名》

⑬ 《荀子·性恶》:“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句,历来把“辨合”与“符验”联在一起解作:用实际来验证。今冯契同志把两者分别释为:“经过正确的分析和综合”与“理论要得到事实的验证”(见《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第3页)较为恰当。

⑭ 《荀子·不苟》。

识的片面性，总结得何等深刻！这是对从孔子的“四毋”教（“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到宋研、尹文“别宥”主张的继承和发展。

最后，荀子的认识论又是对先秦时期知行关系讨论的正确总结。发轫时期认识理论的大争辩，主要是围绕着“名实”关系而展开，同时“形神”关系、“知行”关系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形神关系问题上，荀子已有“形具而神生”的见解^①。不过，这个问题在当时不突出，直到汉以后才成为争论的焦点。知行关系问题，由于当时社会变革实践的需要，较早地被提了出来，各家认识理论都有所论及。荀子非常敏锐地加以总结概括。他吸收了后期墨家对“知”加以分类论述的成果，也把“知”分为“闻知”、“见知”、“征知”、“行知”四个层次。他进而提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②他大致地把人类认识的辩证途径朴素地表达出来了。荀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看到了“知”对于“行”的指导作用，“知明而行无过矣”^③，而且强调了“行”高于“知”，“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④。虽然，荀子所讲的“行”，不等同于现今的“社会实践”概念，但是，也并非只是指道德践履。他甚至把造成“天地官而万物役”的一切征服自然的行动，都称为“行”^⑤。

荀子的认识论，是中国古代认识论发轫时期所能登临的峰巅。荀子，是他那个时代的“巨人”。如果说，孔子谱写了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序曲”，那么，荀子则演奏了扣人心弦的“第一乐章”！当我们欣赏了一部完整的交响乐曲，其序曲和第一乐章是使人不能忘怀的。就以知行关系问题来说，自先秦至现代论争了两千多年。这期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古代认识论的发轫时期，自孔子提出“听其言而观其行”开始，由荀子作出“学至于行之而止矣”的结论。第二阶段为古代认识论的发展时期，继先秦，经汉魏唐宋，至明清之际。由王夫之提出“行必统知”、“知行相资以为用”^⑥的认识理论，把古代认识论推向新的高峰。第三阶段为近代认识论的形成时期。知行问题作为纯粹的认识论问题来研究自孙中山始。孙中山提出的“知难行易”学说，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武器。第四阶段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中国传播与确立的时期。毛泽东同志所写的《实践论》，用“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为副题，正确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观。它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回顾中国认识论发展四个阶段的全部历程，我们清楚地看到每一阶段的认识理论，都是该时代精神的精华，都是该时代经济、政治发展、变革的产物。它们都对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当前我国已进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推动了各项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标志着我国知行关系问题的讨论进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要求认识理论在概括新经验中大大地发展起来。我们不能闭目塞听，拒绝一切外来的认识理论中合理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轻视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把它当作“过时”的东西而置之不理。只有，本之于实践，融合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我国认识理论的研究才会无愧于我们的时代。

①⑤ 《荀子·天论》。

②④ 《荀子·儒效》。

③ 《荀子·劝学》。

⑥ 分别见于《读四书大全说》卷六，《礼记章句》卷三。